

## 经济安全互动视角下 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

于 震\*

〔摘 要〕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使得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逐渐形成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分离的二元格局。在此背景下,为维护地区主导权,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其意图是阻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良好发展势头,并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和安全影响力的转化。而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安全和战略设计上各具优势与不足,所以中国应理性认识,抓住战略机遇与战略突破口,发挥自身经济优势,从拓宽经贸合作国家范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改革以及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面扩大国际影响力,为自身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关键词〕 经济安全;东亚地区合作;区域一体化;二元格局

长期以来,经济与安全关联性问题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热点。在已有研究中,自由主义学派对于两者互动关系及其在地区合作中所扮演角色的阐释最具系统性和代表性<sup>①</sup>。相对于其他理论,自由主义学派更加强调国家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利益,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参与国际性组织提高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成本,进而降低各方付诸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即通过相互依存效应(Interdependence Effect)和制度效应(Institutional Effect)促进地区安全<sup>②</sup>。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深入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性经济组织,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与机制为双边战略协商创造了有利环境,各方实力、资源与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强,误判几率降低。而且,在此

---

\* 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13001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JY109&12BGJ044&11CJL012)、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113)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2FRTD02)的阶段性成果。

①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多个分类,如商业自由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共和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等均属于此派别。相关内容可参考[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51页;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21—152页。

②K.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p. 29—49.

背景下,当国家间关系交恶时,完全可以采用成本更低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措施代替军事干预来实现报复与警告目的<sup>①</sup>。另外,经贸往来活动还可以通过影响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和态度,通过政治游说和争取国民权益等渠道向政府行为施压,改变国家偏好,增加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成本,从而降低国家间出现冲突的可能<sup>②</sup>。自由主义学派中的功能主义理论还认为,在某一功能领域的最初合作能够通过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向其他部门和领域展开;合作领域将不断拓宽,安全规范得以建立,战争因此减少<sup>③</sup>。因此,虽然上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安全互动关系理论增添了佐证,但是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自由主义都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在理论上,与自由主义观点有所不同,现实主义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贸易争端更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并可能因此导致更大的安全竞争<sup>④</sup>;国家间地理距离的靠近倾向于增加冲突发生的机会,而不只是单纯的强化了所谓相互依存<sup>⑤</sup>。显然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具有客观性。其次,在实践中,有别于欧洲从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到欧盟的一体化路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向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溢出”效果远未达到欧洲一体化进程那样符合自由主义理论预期,政治和安全合作的进展异常缓慢,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这一“木桶”的“短板”,同时也引起学界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现实解释力的质疑<sup>⑥</sup>。那么,究竟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性质有何独特之处?什么原因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安全互动观在解释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失灵?应该如何重新审视和利用经济安全互动关系使中国得以在复杂变化的东亚合作格局中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崛起开辟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 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合作的二元格局

当前,区域一体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加速趋势。其中,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集于一身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并逐渐确立了其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而且在此过程中,东亚地区产业内循环机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推动区域内经贸合作的蓬勃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区域内自由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发展不仅有效抵御了区域外市场冲击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为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也使得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度随着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紧密联系不断加深。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3月,东亚区域内生效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已达到52个,还有91个协议正处于规划阶段或谈判之中,而2000年东亚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只有3个。作为其直接成果,东亚区域内贸易份额已由1990年的43.1%扩大

---

<sup>①</sup>D.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sup>②</sup>E. Gartzke, Q. Li & C. Boehmer,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2, 2001, pp. 391—438.

<sup>③</sup>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国家间合作应率先在“低政治”领域进行,随着这种合作的深入以及得到更多人支持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支持后,再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溢出”。但如果溢出效应只发生在功能性领域,那么合作将是短暂的。因此,地区合作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一体化。参见王庆忠:《经济合作与安全竞争:对东亚一体化的反思》,《国际论坛》2010年第5期。

<sup>④</sup>J. Mearsheimer, “Disorder restored”, in G. Allison & G.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 223.

<sup>⑤</sup>K. N. Waltz,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in S. L. Spiegel & K. N. Waltz (eds.)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pp. 454—474.

<sup>⑥</sup>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台湾。但在基于贸易数据的分析中由于朝鲜数据缺失,被排除在外,中国香港则统计在其中。

到2010年的54.7%<sup>①</sup>。伴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整体腾飞,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发生绝对和相对变化,其中以中国最为突出。这不仅体现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带动了东亚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速和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同时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区域内最大经济体以及区域内分工和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中国经济与地区内成员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显著提升,正在逐渐赶超日本成为地区内第一大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并开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导致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成为决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的核心因素之一。

然而,与东亚地区经济繁荣和经贸合作态势良好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极其迟缓。冷战后,众多学者对东亚地区很可能进入充满紧张与冲突的悲观预测并未出现,东亚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了和平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陆续提出并尝试了各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从专注于安全问题与保障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10+8”防长会)、六方会谈,到汇集多议题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等机制,均由于主导者落实力度不足或对安全议题无实质性讨论等原因没有获得稳定而持久的成果<sup>②</sup>。因此,在安全合作模式选择上,目前东亚地区同时并存着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发起和主导的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导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三种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仍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sup>③</sup>。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在东亚地区保持了一定规模的前沿军事存在,依托庞大稳固的双边军事同盟和积极参与地区内多边安全机制,建构并完善了“辐辏”式(Hub-Spokes)地区安全网络<sup>④</sup>。美国东亚同盟国或战略伙伴国(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国)主要依靠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安全保护。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地区成员提供了公共产品——经济,那么美国则凭借其东亚同盟体系和军事存在为地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公共产品——安全<sup>⑤</sup>,这不仅塑造了东亚地区一体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特征,即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揭示了东亚合作格局走向的两大核心因素:中国经济实力崛起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sup>⑥</sup>,同时也肯定了中美两国战略互动对东亚地区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中美战略博弈以及实施两国战略的优势和基础将在下文中作为主要内容展开讨论。

东亚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不仅抑制了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果向安全领域的正向“溢出”,而且通过影响国家行为向东亚合作注入了不稳定性因素。首先,二元格局背景下美国在外交、经济和战略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崛起加以遏制且力度不断加强。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实力上升速度最快、人口与地理规模最大的国家。而单极格局是对崛起国家相对不利的国际结构,霸权国以霸权维护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且制约能力最强<sup>⑦</sup>。其次,二元格局背景下东亚地区部分国家借重美国安全体系“制衡”中国,采取“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策略获取中美矛盾的“红利”,为经济合作赋予了更多安全战略内涵,制约了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也增加了中国缓解和改善周边安全紧张态势的难度与压力。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旦地区合作中

①此处自由贸易协定至少包含一个东亚经济体。数据由ADB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心的FTA数据库整理而得。贸易份额数据为东亚各国区域内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由IMF的DOT数据库整理而得。

②关于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入论述,可参考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③李志斐:《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当代亚太》2010年第6期。

④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

⑤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公共产品主要包括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冲突协调与安全保护等。

⑥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

⑦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

的制度建设兼具经济与战略意图时,执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间进行权衡,此时地区制度完全可能沦为“制衡”工具而不是单纯服务于经济合作。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孤立中国的同时,也逼迫东亚国家陷入了艰难选择的境地。至今为止,东亚地区在经济领域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稳定的区域合作机制。现存制度框架数量众多,交叉重叠,相互竞争,造成了严重的要素扭曲和效率损耗。“制度过剩”现象说明在二元格局背景下经济问题更容易被政治化、战略化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二元格局对于东亚地区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的桎梏。

## 二、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实力对比

在东亚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分离的二元格局背景下,两中心之间已呈现出巨大张力,地区内大国的结构性对抗将导致地区合作格局的失衡状态成为常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崛起的累积性影响开始显现,中国对安全利益的需求在未来必将逐步扩展。而美国在把握东亚地区安全领域主导权的同时,通过推动 TPP 等政策加强与地区内国家的经济联系,意图在经济和安全两条战线上齐头并进,削弱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良好发展势头。正如上文所述,中美两国总体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动态决定了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的趋势与走向。因此,在中国面对经济和安全领域双重压力之时,有必要深入分析中美两国分别在东亚地区经济、安全和战略设计上的优势和劣势,以寻求战略突破口。

### (一) 中国的优势与劣势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内崛起的大国,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不可或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年来保持较高水平,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10% 以上,经济规模随之迅速扩大(见图 1 和图 2)。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伴随着早期东亚地区经济强国日本的衰落。中国经济总量在 2010 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2014 年的经济规模已是日本的两倍半,稳居世界第二。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63.6 万亿人民币,首次突破 10 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 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经济总量超过欧洲三大经济体德、法、意大利的总和,几乎是其他三个金砖国家总和的 1.5 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GDP 从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到成功突破 10 万亿美元用时 14 年,而美国则用了 31 年。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改革,未来的增长模式将更加平衡,不再单纯依赖投资,而是以消费需求为主导,因此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在 7% 左右的增长率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亚行 2015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中预测:在过去 5 年中,亚洲发展中地区对全球 GDP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60%,这个形势今年仍将保持。中国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32%,印度贡献 16%,东盟国家贡献 8%。与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相比,这样的贡献率还是很大的。

第二,中国始终重视并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内双边和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中国积极参与 APEC 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边境经济贸易合作。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2010 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90% 的商品实现零关税。中国与东盟各自有特

色和竞争力的商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适应了双方多方面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双边贸易迅速增长。在中国与东盟“10+1”的示范效应影响下,日本和韩国也陆续与东盟签订了各自的“10+1”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内的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合作。2012年5月,中韩自贸区谈判启动,成为我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的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通过与地区内国家经贸与投资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中国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实质性提升。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和整个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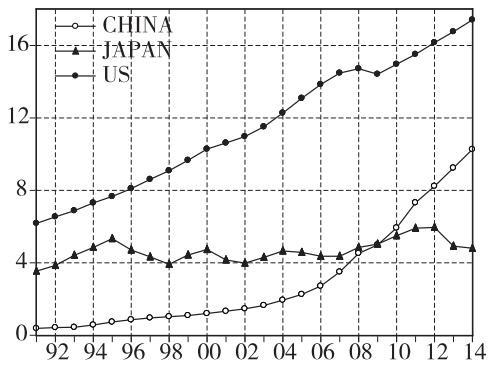


图1 中日美三国 GDP(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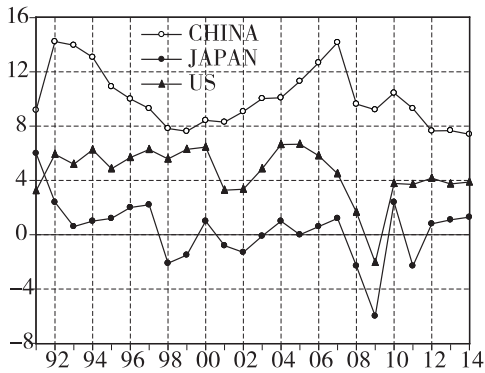


图2 中日美三国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IMF 数据库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东亚分工模式开始向多极化转变,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结点和枢纽。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总量第一大国。国际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的中国开始融入东亚产业链中,并改变了地区原有的贸易格局,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根据WTO测算,2005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亚洲中间品贸易的核心,而日本的地位出现边缘化。作为市场提供者,中国为东亚提供了最大的最终资本品出口市场,并将通过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对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提出挑战<sup>①</sup>。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市场开放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使得地区内国家广泛受益。2012年,中国与亚洲地区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20449.3亿美元,占其全球贸易总额的52.9%,同比增长7.5%,全球实现贸易顺差2311.09亿美元,但在亚洲实现逆差310.04亿美元。而且逆差主要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国家<sup>②</sup>。

然而,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只是初级阶段,从某些角度来看,还远未达到成熟地区经济中心的标准。首先,在东亚地区内,无论是从贸易计价、结算,还是从外汇交易,抑或是从外汇储备角度来看,美元均扮演着主导角色。例如,日本在对亚洲出口(进口)活动中,使用美元结算的比例为53.2%(72.8%),日元43.1%(24.5%),人民币1.2%(1.0%),泰铢0.8%(0.6%),其他货币1.7%(1.1%)。虽然,自2009年中国引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机制,并陆续在相关国家或地区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以来,人民币作为世界支付货币的地位显著提升,但与42.8%使用美元的比例相比1.57%使用人民币的比例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sup>③</sup>。这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出口增长的同时美元储备不断增多,这些美元储备又最终通过资本回流美国形成对“美元体制”的支撑。其次,

① 李晓、冯永琦:《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9年第6期。

② 张宇馨:《中国与东亚中间品贸易发展现状及挑战》,《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6期。

③ 李晓、李俊久:《美元体系内的东亚权利转移:性质及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

中国经济的区域外部依赖性还很强,尤其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经济景气程度受外部市场需求影响非常明显。如表1所示,中国的出口更多地依赖于地区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近几年对东亚地区内国家的出口总和还不及对美国的出口。中国长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人”,同时也是美国“债务人逻辑”的受害者和支撑者,对“美元体制”依赖较强<sup>①</sup>。而相比之下,同作为商品贸易大国,美国的出口市场构成中,出口到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比例达到了35%。再次,随着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跳跃式发展,东亚各经济体间的产业内分工逐渐趋同,差距和梯度缩小,存在向水平型分工演进的趋势。因此,中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而不完全是经济互补。最后,中国作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还非常有限。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虽然对东亚最终产品的需求有所增强,但仅占东亚最终产品出口的7%左右,与日本相差不多。中日两国相加也只有12%左右(见表2)。与地区内市场提供者需求无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出口的强大拉动作用。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美国大幅增加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的进口,在东亚地区最终产品进口的比例有所下滑,但在2013年仍占26%的份额,保证了东亚出口导向性经济增长模式得以维持。

根据自由主义的经济安全互动理论,中国的经济崛起及与东亚地区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推动地区经济繁荣稳定的同时,也提高了国家间冲突的成本,降低了东亚地区国家付诸军事与武力解决矛盾及冲突的意愿。在地区局部性危机与安全摩擦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从安全的经济维度来看,对维护地区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②</sup>。以中日两国为例,虽然两国关系存在较多矛盾与摩擦,但对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往往比较短暂,存在所谓“经热政冷”现象,两国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没有沿着相同方向发展,正是反映了经济对安全的正向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并未有效转化为中国在地区安全中的战略性收益,相反却带来了地区内周边邻国的担忧和美国的战略介入力度增强,催生了东亚地区合作格局的演化。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存在多种类型的安全矛盾,主要有领土领海争端、历史遗留问题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邻国对待中国经济实力崛起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这些国家期望在经济领域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借力中国市场开放、贸易和投资机会赢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国家又担心中国在经济实力增强后实行扩张性政策损害其核心安全利益,尤其是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占据绝对优势。在此背景下,为防范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一些国家转而追求大国制衡战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迎合美国加强地区内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在中美之间“两面下

表1 中国出口市场的分布情况

	出口东亚地区占总出口比重(%)					出口美国占总出口比重(%)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比重	44	30	24	26	25	30	32	28	27	26

资料来源:RIETI-TID 数据库;<http://www.rieti-tid.com/trade.php>

表2 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出口市场的分布情况

	出口中日两国占总出口比重(%)					出口美国占总出口比重(%)				
年份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比重	13	11	11	13	12	35	33	27	26	26

资料来源:RIETI-TID 数据库;<http://www.rieti-tid.com/trade.php>

①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债务人逻辑”》,《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  
②T. J. Pempel, “Introduction: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in northeast Asia”, in T. J. Pempel (ed.) *The Economy-security Nexus in Northeast Asia*, Abingdon, Oxon : Routledge, Taylor & Group, 2013, p. 12.

注”(Hedging Bets),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平衡<sup>①</sup>。倚仗美国的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的邻国倾向于在谈判中态度强硬,而美国对其诉求和主张的偏袒不仅对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构成了挑战,增加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和解难度,也鼓励了其他与中国有类似争端的国家纷纷效仿,向中国发难,造成并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紧张与恶化。

## (二) 美国的优势与劣势

与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内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相比,美国在经济领域与地区内国家呈现出渐行渐远的趋势(见表1和表2)。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个正式盟国中,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各自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美国在本地区的三个重要安全伙伴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都是中国。美国显然担心其盟国和安全伙伴国与中国经济的紧密联系与依赖会在中国安全领域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影响它们对美国的支持。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冲击了美国地区主导权的基础,而且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担心地区经济中心会演变成为安全中心。

与东亚地区内的经济地位不同,美国始终把握着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目前,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以双边军事同盟和准同盟为支柱,以参与地区内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其主导的安全网络从关注特定威胁扩展为关注地区安全,对于保障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建立有效制约了日本谋求东亚地区政治和军事大国及地区领导地位的野心,解除了其他国家对于日本发展方向的疑虑。同时压制和防范了中国崛起,并平衡了地区大国中日之间的矛盾;其次,美国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东亚地区弱国的侵略,为其提供了安全预期;最后,美国能够提供危机管理,防止冲突升级和战争,控制武器扩散,控制台海局势<sup>②</sup>。

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根据中美总体实力对比情况对其策略方向进行了阶段性调整,而中国多年来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使其在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进中不断处于被动调整局面。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尽管中国的实力有所上升,但远未达到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水平。面对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中国,美国采取了一种被认为成本较低的“接触加遏制并重”战略。而同时期的中国顺应当时国际形势,根据自身实力和利益关切,执行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针对地区安全问题和矛盾总体上采取了克制自身利益、不挑衅、不激化,不与美国强硬对抗的政策,从而稳固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降低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战略制衡,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促成了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长期稳定。然而,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采取不同战略造成了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安全影响力发展不匹配的局面,阻碍了中国经济实力向安全实力的“溢出”,本质上已成为二元格局得以稳定的支撑<sup>③</sup>。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与规模增强,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同时中国与东亚地区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美国对华战略开始远离“接触”层面而向“遏制加围堵”方向倾斜,且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进一步压缩了中国的战略空间。

但美国的对华战略并不是无懈可击,而是存在一定“短板”。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来说,就存在战略失衡与不可持续问题。2009年7月美国宣布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高调“重返亚太”。2013年初又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取代“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集合了经济、地缘政治甚至是美国国内政治等综合意图,是美国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多管齐下”维护美国全球霸权,推动美国

<sup>①</sup>关于两面下注政策,可参考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sup>②</sup>陈寒溪、孙学峰:《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sup>③</sup>关于东亚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形成与影响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经济复苏,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扩大的战略升级。该战略不仅力图巩固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中不可挑战的主导地位,而且在政策组合和设计上强调了军事安全领域优势向经济领域的“溢出”,增大了在经济领域对中国施压力度,制约中国经济影响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是地区安全秩序对经济秩序制约作用的充分展现,且已初步达到了在经济规则方面压制中国影响力的目的。

然而,“再平衡”战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首先,美国从“再平衡”战略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可能极其有限,无法实现利用其在地区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向经济领域“溢出”的战略意图<sup>①</sup>,原因有:1. TPP发展前景未明。TPP的门槛颇高,而现有APEC内部成员结构又比较复杂,使得“众口难调”。如日本在选择是否加入TPP问题上就异常纠结;2. TPP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不仅无法解决已有的制度过剩问题,而且破坏了地区内原有合作格局的稳定性。TPP阻碍了东盟所主导“10+6”的谈判进程,使得东盟内部只有一部分国家选择加入TPP,而东盟内部“双轨制”的形成势必削弱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保持的“驾驶员”地位;3. TPP排除了中国,鉴于中国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势必会破坏原有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sup>②</sup>。4.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加剧了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又期望自身实现在该地区的“出口倍增”,两者相悖;5. 成本收益分析显示,美国通过TPP基本无法获取经济收益,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等非传统经济收益的工具<sup>③</sup>。其次,“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性受到美国财政状况的制约。“再平衡”战略需要大量的防务和外交开支,而美国当前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境,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内政作为支撑“再平衡”战略的基础,在美国无法从亚太再平衡中获取相应经济利益作为补充的情况下,勉强所取得的军事霸权维系,也只能保证东亚格局在安全领域的相对稳定,但在经济与安全相互制衡机制下,“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性值得怀疑,地缘政治迟早要被地缘经济拖垮<sup>④</sup>。再次,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需要其不断平衡与欧洲及中东等地区的战略投入关系,容易留下战略空隙,根本无法打造出“完美平衡”的全球战略。最后,“再平衡”战略使得美国更加深度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但其主导的安全合作模式决定了其无法彻底解决地区原有矛盾,反而可能被其盟友或准盟友的战略所绑架,卷入到真正的军事冲突,为自身带来尴尬和安全威胁,损害其在亚洲的利益。对于东亚的传统大国日本来说,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除了在地区主导权上对其形成威胁外,还使得两国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右倾等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而且存在长期化趋势。中日两国的矛盾显然有利于美国管理东亚地区安全秩序。近年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有加强趋势,对日本在军事体制自主性、自由度和正常化水平上的限制有所放松,给了日本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在增强日本与中国博弈力量的同时也为中日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 三、基于经济安全互动视角的中国战略选择

经济安全互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可以利用处于相对优势的任一方面在另一个方面获得“溢出”性利益,即实现两方面优势的转换。然而,现实中经济安全互动关系往往存在一定的单向性,即一国可以利用其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获取经济利益,但利用经济优势赢得政治与安全利益则相

---

①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②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③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

④俞正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2期。



对困难且具有长期性<sup>①</sup>。这对于中国的全面崛起显然非常不利,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可以从以下方面出发,发挥自身优势,抓住战略机遇与战略空隙,为自身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一) 经济领域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相对优势所在,因此在该领域中国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性,所面临的行动障碍也相对较弱。这就决定了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领域仍将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具体而言主要可在三个方面加强努力。

第一,继续大力推进本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实质性提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如前所述,中国在区域贸易和货币领域的非主导地位抑制了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善与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的贸易结构及其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都需要具有决定意义的实质性变化,而这本质上要求中国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消费与生产两个层面进行调整,既需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上,也需要产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需要提高政策当局的“需求管理”能力,避免错误的需求“总量调节”政策,有效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与创新,以此促进产能的结构性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顺利实现,无论对于中国在东亚经济中的市场地位,还是对于中国引领区域经济制度安排的能力,都具有基础性的关键作用。

第二,抓住战略机遇,整合战略空间,扩大合作范围,提升自身的地区经济影响能力,对冲战略围堵。2013 年中国提出了与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东盟国家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经济合作构想,体现了中国试图扩大与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以及通过谋求经济共同发展来稳定周边地缘环境的战略意图。众所周知,美国为排挤中国而推进的 TPP 和 TTIP(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都是按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高规格贸易规则标准,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和中国一样被 TPP 与 TTIP 谈判拒之门外。而“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恰恰就是这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抓住了战略机遇和美国战略空隙,为 TPP 和 TTIP 之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摆脱地缘经济困境的良机,因此得到了广泛支持。该战略本质上是在美国领导力缺乏、区域合作机制化程度较低的中亚、南亚、中东及其他相关地区推行一体化战略。中国通过该战略一方面可以避免在东亚与美国直面竞争,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自身影响力,以经济合作逐步带动和整合政治与安全领域合作。该战略是构建贯穿欧亚大陆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将在东亚地区之外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更广泛的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仅仅与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融合,不仅化解了美国以 TPP 为手段对中国的挤压,还对其遏制和围堵形成了有效的反制,争取了战略主动性。

第三,抓住时代契机,利用自身经济优势,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改革,加强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化。近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发起和创立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垄断发起了挑战,可视为中国经济领域优势向政治领域“溢出”的成功范例,同时也为中国下阶段的经济外交开辟了新思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开始集体显露出经济低迷趋势。面对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由发达国家组成的 G7/G8 集团自感力不从心,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为 global 危机买单,同时又不愿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造成了中国等国家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的严重不相匹配。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应对“欧债危机”的态度反差也给予了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良机。作为“次贷危机”的延续,在 2009 年欧洲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不但没有积极救助,其三大评级机构还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希腊等债务国的信用评级,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恶

---

<sup>①</sup> 阎学通:《安全实力与经济实力难以相互替代》,《环球时报》2003 年 2 月 14 日;关于美国利用其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的分析,可参考 S. G. Brooks, G. J. Ikenberry & W.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3, 2012, pp: 7—51.

化。与之相比,由于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相对有限,且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而被众多重债国家视为“救星”而争相求助,提供了中国更多参与欧洲经济合作和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机会。另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也使得欧洲对于借力东亚地区经济“快车”的兴趣倍增,而亚投行的发起正是顺应了当前国际力量格局演进和国际经济关系加速调整的潮流,因此才取得了“始料未及”的支持与回应。亚投行的创立不仅有助于中国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将通过向“一带一路”提供资本支持形成战略之间的相互配合,保障国家战略实施的整体性。这种主动搭建“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与区域制度化经济合作安排的做法,不仅对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而且相比非制度化的经济合作进程,更易于在非经济领域实现“溢出”性利益,因此应在未来的战略分析和设计中充分借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中国搭建“以我为主”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另起炉灶,而是作为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补充。

(二) 尽管中国在经济领域有更大的战略操作空间,但在东亚地区二元格局制约下,由于经济安全互动作用的相对弱化,为了获得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有利地位,中国仍需在这些领域做出战略调整,通过在可行条件下更加直接的努力改善其面临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第一,中国可以对“韬光养晦”战略进行局部调整,根据东亚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的主动行动,构建差别化的双边关系与安全合作机制。如前所述,中国多年来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使其在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进中不断处于被动调整局面,而若想在东亚建设新的区域性安全合作机制又面临着重重困难。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包括其他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错综复杂,决定了任何制度化的囊括全区域的“安全共同体”建设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需要调整其“韬光养晦”战略,另一方面这一调整又需要遵循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原则,率先在条件成熟的领域进行改变<sup>①</sup>。可行的办法就是根据中国与东亚不同国家的关系特点及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对其采取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构建差别化的双边关系与安全合作机制。也就是不以整个区域或地区性组织为目标,而是针对与中国有着更加良好稳定关系并有更多共同诉求的国家,进行更加主动的政治接触与安全合作,争取与这些国家率先构建某种形式的政治与安全合作机制,以此作为进一步扩大政治、安全影响力的基础。考虑到这一做法不形成对地区现有整体安全架构的冲击,其面临的障碍相对也会较小,因而可行性更强。

第二,中国可以争取加强与其他东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争取为本地区提供多元化的安全公共产品。在提供安全这一重要公共产品方面,中国在东亚地区始终未能有大的作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已经扮演了地区安全中心角色,中国若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领域为中国在地区安全合作与建设中发挥主动作用提供了新的空间。一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sup>②</sup>。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介入也相对有限<sup>③</sup>。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通过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地区内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绕过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重重限制,并进而实现经济、安全的良性互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系统性工程,因此在这一进程中

<sup>①</sup> 参见陈向阳:《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仍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0日。

<sup>②</sup> 肖晔:《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

<sup>③</sup> 刘卿:《论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中国需要以组合而非单一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实现政策手段的相互配合和优化组合<sup>①</sup>。也就是说,上述各方面的努力应是相互配合而非相互独立,只有在国内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与安全关系建设等领域进行综合协调的战略设计与操作,才会实现经济安全的良性互动,最终进一步改善经济政治地位。

(责任编辑:杨嵘均)

## Evolution of the Cooperation Pattern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ecurity Nexus

YU Zhen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East Asia due to 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hina's rise for its economic strength. A du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the separation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enters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In this context, America has implemented a containment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 both economic and security fields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its regional dominance. America has every intention of impeding China's momentum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clout to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louts. China and America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garding issues on the economy, security and strategic design in East Asia. Hence, China should adopt a rational think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economic advantages to grasp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dditionally, China should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rough extending the coverage of countries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right to se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u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in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so as to create a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nomic security; East Asian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dual pattern

---

<sup>①</sup>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